

什么是灰色收入?如何规范灰色收入?灰色收入是非税的合法收入吗?部 分代表委员讨论中担忧——

灰色收入会不会变成“腐败小夹袄”

□本报记者 鹿慧敏 兰海燕 王冬梅 赵晓晨



“坚决打击取缔非法收入,规范灰色收入,逐步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坚决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句话,使灰色收入成为本届两会期间代表委员和公众热议的话题。

有人认为这是非税的合法收入,有人担心会演变成“腐败小夹袄”……到底什么是灰色收入?灰色收入该如何规范?代表委员们的意见和看法并不相同,但一个共同的声音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能首次直面灰色收入,不遮掩,不回避,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政府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决心和勇气。

灰色收入的暧昧身影

“上个月我利用下班时间做了个私活,挣了2000元钱,这算灰色收入吗?”总理刚刚做完政府工作报告,网友“霜之哀伤”便在网上晒起了自己的灰色收入。随后,不少网友加入其中。

全国政协委员张抗抗说,“在普通人的理解中,灰色收入一般指回扣、红包等半贿赂性质的收入,“应该算做不合法收入,但不知要如何规范?”

灰色收入其实不算一个新鲜词。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出现了一个灰色空间,带着一点暧昧概念的灰色收入逐渐走进了公众视野——医疗卫生界有灰色收入、教师有灰色收入,甚至丧葬业也有灰色收入……

“灰色收入应该不含任何贬义的色彩。”在著名经济学专家茅于軾看来,它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灰色收入的出现预示着经济开始活跃,个人有了更多发挥、运用自己长处的机会。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则认为,灰色收入可以理解成公职人员工资之外的收入,如一些感谢费、劳务费、补贴之类的收入。比如,一些单位效益好,在工资之外又发了很多补贴,这种收入就不够透明和阳光,也可能不符合国家有关政策,“应该说,这些收入存在着一个不合理的问题,但这种收入又与贪污受贿截然不同,很难将它

归于非法之列。”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灰色收入的说法是相对的。“应该是有白色收入和黑色收入,然后才有灰色收入。”杨宜勇解释说,黑色收入就是违法所得的收入,白色收入就是公开透明的合法收入,而灰色收入是平常人看得不太清楚的收入。比如单位正常劳动报酬之外的收入,一个大学教授的工资是白色收入,到其它学校作讲座的收入可能就是灰色收入。

灰色收入有多“灰”

在有关部门的各种统计年鉴中,找不到任何关于中国灰色收入的正式统计数字,不少专家也表示目前没有、也不可能有这么方面的确切数字。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研究员为摸清灰色收入的真实情况,曾对全国几十个城市和县的2000多名不同收入阶层居民进行家庭收支调查。

王小鲁经过调查推算,2005年中国有4.8万亿元隐形收入被统计遗漏,约占当年GDP的26%。

王小鲁认为,灰色收入显著扩大了收入

差距,而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非市场因素导致。

在王小鲁看来,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一是公共资金的流失,包括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拨款;二是金融腐败,主要是官方贷款和民间贷款巨大的利差为金融机构提供的寻租机会;此外还有行政许可、行政审批中的寻租行为以及土地收益的流失;最后是垄断行业的收入。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建忠认为,灰色收入真正的“大头儿”在公权寻租的权钱交易中,以及垄断行业的不公平获利中。“如果说初次分配不公是导致贫富差距逐步加大的直接原因,那么灰色收入则充当了背后的一个强力推手。”

有网友把“丧葬业、教育业、旅游业、医疗卫生业”列为涉及灰色收入的四大行业,也有网友站出来为教师、医生等职业辩护。

网友“木渔潭”在其博客中对灰色收入的描述颇具代表性:灰色收入是不能堂堂正正摆上台面的隐性收入,只能私下里偷偷给,悄悄拿,属于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心照不宣的桌子底下的收入。灰色收入打的是

法律法规的擦边球,走的是高难度的钢丝绳。

分清黑白,走出模糊地带

从代表委员及百姓的争议中不难看出,尽管灰色收入这个词很常用,定义却并不清晰。正因此,有代表委员担心,对某些公职人员而言,规范灰色收入是不是意味着将灰色收入合法化?

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指出,规范灰色收入,并不是为灰色收入正名,也不是简单地把灰色收入变“白”或变“黑”,而是要把白色收入和黑色收入清晰地界定开,不要再出现模糊地带。

全国人大代表、华侨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戴仲川也赞同这一说法:规范就是要把不明朗的状态明晰化,找出一条界线,合法的归入合法,非法的要求采取措施施压。某些行业灰色收入比重比较大,会引起分配不公。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调整收入分配体制,把灰色收入纳入到规范范围内,就是缩小分配差距的一个措施。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透露,目前正在研究规范灰色收入的具体办法。一些专家纷纷出谋划策。中央党校教授、著名反腐专家林■建议将灰色收入纳入征税范围,并实行全民财产申报制度。林■认为,任何未反映在工资单上、未纳入征税范围的收入都属于灰色收入。不仅官员有,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学者、演艺明星、普通职员也有。林■表示,这需要多个部门的参与,推行起来并不容易。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锡荣表示,总体来讲,灰色收入应该申报,应该缴纳所得税。对于如何监督、是否申报等,他认为是个技术问题,会牵涉到各个行业,需要进一步细化和研究。

(本报北京3月12日电)

履职没有闭会日

为代表委员日常履职 搭建更多平台呼声高

本报北京3月12日电 (记者王娇萍 郑莉)两会临近尾声,如何在闭会期间履职、更好地发挥代表委员作用,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一个共同的呼声是:代表委员履职不止在两会期间的十几天,而应延伸到一年365天,“履职没有闭会日”。

“两会是代表委员履职的重要平台和形式,因此首先要高质量地开好会。”全国政协委员宋欣表示,就每一位代表委员来说,既然来参会,就要认真对待,珍惜每一次发言机会,建有用之言,献管用之策。

据宋欣介绍,他所在的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领导就十分支持集团里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履职。集团党组书记、总经理许达哲强调,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作为央企要扛起“顶梁之责”,不仅要承担起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任务,还要履行好社会责任,特别是要为所在辖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公益事业多作贡献,在这方面,集团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切实履职至关重要。

作为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二院院长,宋欣日常工作任务非常繁重,但两会期间每次活动他从不缺席,每回小组讨论都准时参加。不过宋欣也表示,两会毕竟只有十几天,要更好地发挥代表委员作用,还应为代表委员闭会期间履职搭建更多的平台,创造更好的条件。

“比如,以界别为单位开展活动,通过组织不同界别联合讨论、常年提交提案等形式,更好地发挥各界别委员和专门委员会的作用。”宋欣还表示,自己曾担任过北京市丰台区人大代表,发现担任党政领导的人大代表因工作变动离开原选举单位(选区)后,可能会因为情况不再熟悉或工作原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履职效果,“诸如此类问题的解决,需要从实际出发探索出可行的办法。”

“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高峰提前到达,且是‘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典型国家,为此建议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相关问题,从国家制度设计层面,充分调动和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全方位建立健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可持续发展。”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裁王明辉说。

我国“跑步”进入老龄社会

按国际惯例,当60岁以上人口比率超过总人口的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比率超过总人口的7%,就被称为“老龄化社会”,而超过了14%就被称为“老龄社会”。

据悉,在发达国家,老龄化比例从5%上升到了10%用了40年或更长的时间;而在我国,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和预期寿命提高的原因,在20年间就完成了同样的增长。根据联合国的人口统计数据,中国将在2024年至2026年前后进入老龄社会。

王明辉代表介绍,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当年就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老龄化问题引发的人口红利提前结束、养老保障体系不完善、老龄产业发展滞后三大问题和相关矛盾日趋突出,如果不加以重视和解决,将会影响到社会和谐甚至国家的稳定。

1998年,我国在职职工与退休人员的供养比是13:1;而到2008年,这个比例变成了3:1,预计到2020年,领取养老金的退休者将超过1亿人,供养比例将达到2.5:1或更高。老龄



赵长义代表建议——

将沈阳经济区确定为全国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本报讯 (记者顾威)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沈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长义提出的建议是,将沈阳经济区确定为全国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沈阳经济区涵盖了以沈阳为中心、半径100公里范围内的鞍山、抚顺、本溪、营口、阜新、辽阳、铁岭8个省辖市,拥有全国闻名的重化工业基地城市、国家一类对外开放口岸、东北地区最大的航空港、全国密度较高的一小时城际交通网络,是国内乃至东北亚地区发展条件较优越的工业型城市密集区。

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以来,辽宁老

工业基地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但长期以来形成的结构性、体制性和机制性矛盾尚未得到根本解决。

因此,赵长义代表提出,要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必须加快体制机制创新,形成强大、持续的动力支持,以及完善有效的体制保障。这样做意义重大;有利于解决老工业基地改革发展中的体制机制矛盾,带动全国其它老工业基地向新型工业化全面转变;有利于促进我国参与东北亚经济合作,拓展全国对外开放新空间;有利于发挥沈阳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加快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同时对加快东北

社会保障体系有待完善

目前,我国养老保险覆盖面不够大、制度设计尚有漏洞。王明辉代表一针见血地指出。2008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支出总额达到7390亿元,比2000年增加了249%,中央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补贴支出相应快速攀升,离退休、退职费用也呈现连年猛增的趋势。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老龄人口高达1.8亿,尽管政府在养老保险方面的支出已在逐年提升,但中国养老保险的覆盖率仍然很低,参保人数却仅占应保人数的20%。

王明辉代表说,“我国在社会保障制度设计上,存在的问题有六个方面:现行养老保险

老工业基地振兴进程,形成与东西中互动、共同发展的全国区域发展新格局至关重要。

赵长义表示,沈阳经济区实施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区域合作基础。从2003年开始,沈阳经济区内的城市就已经建立了高层协调机制,共同签署了《沈阳经济区合作协议》,形成了交通运输、商贸流通、信息产业、人才交流、科技创新等领域的50余项合作。省政协连续6年举办沈阳经济区发展论坛,沈阳经济区8市连续召开了5次书记市长联席会议,为沈阳经济区一体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政协委员谈推进政治协商

3月12日,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主题为“政协委员谈推进政治协商”的集体采访。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政协主席周国富,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省政协主席傅克诚,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市政协主席朱振中、福州市政协副主席王聪深出席并回答记者提问。

这是集体采访结束后,记者们继续向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市政协主席朱振中提问。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上接第1版)

医疗这个“窟窿”应由财政来填

在北京西直门宾馆采访时,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第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马恒昌小组组长孙普选对记者算了一笔医疗账:今年57岁的他,4年前突患脑梗塞,此后每年春秋时节都得打两次点滴以防复发。“打一次300元,打两次就花光了我医保卡上的钱,一年中再看门诊就得自掏腰包了。”

孙普选感叹,医保卡上的钱能多一点就好了,否则岁数再大些压力就大了。

对于孙普选的担忧,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友谊医院心胸外科主任王天佑认为,每位公民都享有健康权,政府应该加大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

王天佑说,目前我国的GDP增速很快,但国家在卫生总费用上的投入只占GDP的4.96%。他表示,前两年他所在的北京友谊医院做过统计,国家财政投入只占医院经费的7%~8%,剩下的全靠医院自己努力。政府投入太少,催生了医院“以药养医”等机制,引发了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等矛盾。

王天佑希望政府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在GDP中的占比能逐步提高到5%~10%。

[回应]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积极稳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继续扩大基本医疗保障覆盖面。今年要把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的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120元,比上年增长50%。

投入不足仍在制约教育发展

“一个4%用了17年都没有解决,这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在黑龙江代表团驻地,记者对全国人大代表张雅英的采访,就从一个

企业也应承担

文化传承的责任

□郭振纲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威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建华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作为一名企业家,我深深感到,物质财产不能永恒,但文化却是永恒的,优秀的历史文化才是激励时代前进的动力。企业要想成为百年企业,要靠靠历史文化培育自己的企业文化,形成企业内部

的凝聚力量和创新力量。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一个民族真正有力量的决定性因素,可以深刻影响一个国家发展的进程,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而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传统基础上不断创新,才能形成“真正有力量的决定性因素”。

文化传承是民族延续的纽带,需要全社会重视和身体力行。尽管各级政府是文化传承的推动主体,但其他社会主体也应文化传承尽心尽力。如果文化传承不能成为全社会的共同意识,即使政府部门全力推动,也会事倍功半。

作为创造财富的主体,企业在传承文化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责任。企业重视不重视企业文化,关系到企业能否贯彻质量第一、消费安全等一系列经营理念,缺乏企业文化的企业,不仅会使培植百年老店的理想成为空话,而且也会影响到社会诚信等文化理念的深入。

如果企业不重视文化传承,必然会导致不重视安全生产,忽视产品质量等问题,如此,就会形成一种忽视文化传承的不健康倾向,以文化为内核的软实力就会逐渐丧失。

无论从企业自身生存和发展,还是从国家的进步而言,企业都有责任为文化建设作出更多贡献,有责任推动历史文化的传承。

数字开始。

早在1993年,中央就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纪末达到4%”。但迄今为止,“4%”的政策目标一直没有实现。

“应该说,党和政府对教育问题一直非常关注,从2004年到2008年,我国公共财政教育支出从4000多亿元增加到9700多亿元。”张雅英说,尽管如此,投入不足仍然是制约中国教育发展的一大障碍。“政府应该继续加大投入力度,确保4%的目标实现,而在一些大城市和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这一比例完全可以更高一些。”

全国政协委员、辽宁铁岭市政协副主席金要山认为,教育因为投入不足,引出了很多问题;首先带来的问题是教育发展的不均恒,由此引起了城乡、区域、校际间的差别。另外,因为投入的不足,也使得教育内涵的发展,包括教师队伍建设、学校现代化的水平、信息化的程度,都不能符合新时期发展的要求。

张雅英说,投入的不足,也使得目前部分教师缺乏职业的幸福感和崇高感,从而影响到教育质量的提高和教育的均衡化发展。“表现最强烈的,现在还有相当多的学校达不到基本的办学要求,甚至还有在几十年前建的危房里上课的现象。”

[回应]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强国必先强教。只有一流的教育,才能培养一流人才,建设一流国家。不普及和提高教育,国家不可能强盛。

此前,2月28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公开向全社会征求意见,其中明确提出:到2012年要实现4%的目标。(本报北京3月12日电)

应”,可使一部分中、高收入群体因参加商业人寿保险,老年时获得丰厚的收入,自愿放弃政府养老金的参保,这将使有限的国民养老金资源得到更好的利用,商业人寿保险可成为政府保险的重要补充方式;鼓励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的发展,通过社会力量部分解决老年人养老补助的问题。

在市场经济上,在企业建立企业年金,鼓励员工积极参与,建议给个人缴费部分的税收免除优惠;在农村,个人与集体共担养老资金,具体为个人缴费,国家、集体给与补助,完全记入个人账户,归个人所有。

在个人层面上,赡养老人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并主张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和个人着眼于长远的储蓄行为。

据预测,到2010年,我国老龄人口消费规模将超过1.4万亿元,2020年接近3.4万亿元,2030年达到13万亿元。老年人的消费比重将由2000年的9.67%上升到2050年的28.29%。无论从规模还是所占的比重,人口老龄化对未来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建议政府未雨绸缪,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正视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客观存在及其可能带来的挑战和影响,尽早制定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总体战略规划,从法律完善、政策体系和措施制定入手,从社会、政治、经济、产业等方面统筹安排,避免矛盾后患,最大限度缓解、降低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可持续发展。(张兆林)